

李春生生命中的兩項抉擇

一、引言：東亞歷史轉型期中的李春生

李春生（一八三八—一九二四）的一生通貫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東亞歷史轉型期的時代。他的一生見證了臺灣歷史的重大轉捩點——一八九五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開啟了長達五十一年異民族殖民統治。李春生在割臺之前，已經是臺灣知名的富豪與社會賢達，割臺之後，應日本殖民當局之邀赴日訪問。他的一生在臺灣歷史風狂雨驟之中度過。他的生命經歷兩項抉擇：第一是演化論（Evolutionism）與上帝創造論（Creationism）之間的抉擇，第二是仕或隱的抉擇。面對生命中的這兩項重大抉擇，李春生以堅定的基督教信仰，堅守上帝創造論的信仰；他也在一八九六年訪問日本歸來以後，選擇歸隱的道路。在我們進入李春生生命的兩項抉擇之前，讓我們先簡略介紹李春生的生涯及其著作。

李春生原籍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生於西元一八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清道光十七年農曆十二月十七日），從小學習漢文及英文，十五歲隨著父親皈依基督教，成為虔誠的教徒^①。堅定的基督教信仰使他在一九〇七年以七十高齡發表《天演論書後》，批判達爾文的演化論。清咸豐年間，李春生在故鄉廈門經營四達商行，販賣茶葉。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六月，李春生來到臺灣，在寶順洋行及和記洋行擔任經理，



Huang, Chun-chieh
黃俊傑



開始在大稻埕經營茶葉販售。一八七八（光緒四）年四月，李春生出任清政府之臺北城建設委員。

李春生經商致富之後，捐輸不遺餘力，在一八八二（光緒八）年二月因臺灣巡撫之保舉而獲「敘五品同知加營戴藍翎」官銜。一八八七（光緒十三）年四月，李春生出任臺北府清丈委員，一八八九年出任臺灣鐵路敷設委員。一八九五（光緒二十一年）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戰敗，割讓臺灣。同年六月十二日，日軍開抵基隆，臺北清兵逃散，土匪蜂起，民心不安。李春生當時已經是各方仰望、舉足輕重的社會領袖，在亂局中出面邀請臺北各界領袖商談因應變局。李春生獲眾人推薦為領導人，急請美國領事官及英商和記洋行英人同往基隆，向日軍報達民意，使臺北免於戰禍。日本佔領臺灣的次年（一八九六），日本殖民政府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邀請五十九歲的李春生赴日本訪問。李春生返臺後撰寫《東遊六十四日隨筆》，記述他訪問日本期間所見所思。

訪日歸來以後的李春生，從社會領袖的身分中逐漸歸隱，但常常有捐輸、救濟等社會活動，例如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九日，出任臺北國語（日語）傳習所大稻埕分教場學務委員，也捐三百坪土地及日幣二千圓，於臺北西門街外建設濟南街禮拜堂（即今濟南教會）。一八九七年以後的李春生，潛心著述，對演化學論、自由、民主、共產思想等新思潮，均有所闡釋或批判^②，至一九一四年七十七之齡，共出版以下十二種著作：

- (1) 《主津新集》（一八九四年，臺灣日日新報出版）
- (2) 《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一八九六年，福州美華書局出版）
- (3) 《主津後集》（一八九八年，臺灣日日新報出版）
- (4) 《民教冤獄解》（一九〇三年，福州美華書局出版）
- (5) 《民教冤獄續篇》（一九〇三年，福州美華書局出版）
- (6) 《民教冤獄續篇補遺》（一九〇六年，福州美華書局出版）



- (7) 《耶蘇教聖識闡釋備考》(一九〇六年，福州美華書局出版)
 (8) 《天演論書後》(一九〇七年，福州美華書局出版)
 (9) 《東西哲衡》(一九〇八年，福州美華書局出版)
 (10) 《宗教五德備考》(一九一〇年，臺灣日日新報出版)
 (11) 《哲衡續篇》(一九一一年，福州美華書局出版)
 (12) 《聖經闡要講義》(一九一四年，臺灣日日新報出版)

我們將進入李春生著作中所呈現的思想世界，分析他面對生命中的兩項抉擇時的思考及其論證，並且探討其抉擇的意義。

二、第一項抉擇：以上帝創造說拒斥達爾文演化論

一八五九年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出版《物種原始》一書，主張動植物不同世代均經過演化之歷程，演化之原則是「自然淘汰」與「適者生存」。達爾文的演化論提出之後，不僅在生物學界造成重大影響，對思想界也有巨大的衝擊。二十世紀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就說：《物種原始》一書之問世改變了人類的思想模式，並且創造了一種用之於心靈、道德與生活方式的新邏輯。^③二十世紀美國的思想家深受演化論之影響。例如，當時成立於麻州劍橋(Cambridge)，以皮耳士(Charles Peirce)為中心的「形上學俱樂部」(Metaphysical Club)諸成員之中，萊特(Chauncey Wright, 1830-1875)、詹姆士(William James, 1842-1910)、費斯噶(John Fiske, 1842-1901)、葛林(Nicholas St. John Green, 1830-1876)及霍姆斯(Oliver Wendall Holmes, 1841-1935)等人思想皆受演化觀念之影響^④。在演化論的衝擊之下，十九世紀末葉的美國社會中，許多人的基督教信仰開始動搖，而造成思想史家所謂的「精神危機」。^⑤

對所有虔誠的基督徒而言，達爾文的演化論是一項巨大的挑戰。李春生面對演化論時，以其堅定的基督教信仰，對演化論嚴加駁斥。李春生首先批判達爾文崇有形之考據，而棄無形之神學。他說：

我甚怪赫胥黎氏《天演論》一書，宗旨專為實驗考據。所謂實驗考據者，其在可視聽摸索、有實質之現物，故能為實驗考據之標準。若在憑虛無形、不能目營手治者，雖神若無形之帝天，聖如既往之孔子，亦不能免其視等怪誕不經之說。所以然者，是其存心摒棄一切憑虛無形之神學。獨不解何其書中復有句曰：「夫學必自不可思議為起點。」試問「不可思議」云者，豈非憑虛無形之極則，特與實驗考據相衝突者乎？^⑥

李春生強調：宇宙間除了經由實驗考據之方法而掌握的現象之外，尚有「不可思議」之境界。這種「不可思議」之現象，乃由「神」所創造。李春生接著強調：

宇宙間獨無而僅有者，厥惟一物，字曰至神。運其大智，行同至愚，富有全宇，仁並天地，榮逾日月，博施濟眾，任取任攜，誰毀誰譽，不予立計。若而神者，舍造物真宰，豈一自然語助能當之乎？彼赫氏輩，欲譏而滅之，亦多見其不自量也。^⑦

李春生堅信神為創造宇宙萬物之主，而人更是「搏土特造之神物」。李春生說：

鄙人最不忘情於彼格致家之學說者，天地閒萬物彷彿同具一形者，若魚之於海，大都一尾而兩翅；鳥之於空，大都針喙而兩翼；獸之於陸，大都四足而脩尾。其間最親切近似者，若麥之於粟，



柑之於橘，鴉之於鵲，鳩之於鴿，麋之於鹿，驢之於馬，狐狸之於豺狼，凡此更僕難數，僥倖而能各仍其特別之族類，而不被指為遞變而後成者。至於人，則為彼達爾文所不容，誣其為由猩猩而變者，且曰：「有謂不然者，必勒令具出不然之理由，否則必同認猿猴為元祖。」嗟乎！彼輩曾歎賞萬物繁蹟，謂玫瑰一類數百種，蝴蝶一類數千種，斯乃最親切近似者，何不誣其由始而遞變者，獨於人則不容其與猿猴、猩猩，同一親切近似之別種者？時至今日，舉歐、美二洲之文人學士，猶昏昏夢夢，疑其同一下生族類，非為搏土特造之神物。哀哉！信如達爾文之言，設也不幸猩猩而不變人，則此千紅萬紫、十色五光之世界，豈非為無知之禽獸而徒備乎？抑此地中水內諸寶貴，亦為虛設而徒藏乎？嗚乎！吾於達氏之說，助我益信吾之始祖，確為搏土特造之神物，豈不然哉？^⑧

從以上所徵引李春生駁斥演化論的幾段話，可以看出李春生是一個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t）。所謂「基本教義派」是指崇信《聖經》的每一個字皆為真理的態度。李春生早在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三十七歲時，就在《萬國公報》撰文，主張《聖經》是「吾國之所無，而猶不可無者，蓋有天道藏乎其間耳」。^⑨

李春生從一個基本教義派的信仰者立場出發，甚至認為日本之所以強盛，就是因為日本信仰自由，國家領導人皆信基督教^⑩，而中國之所以積弱，被列強侵凌，實因中國擯棄基督教信仰。李春生說：

今之仰維新、慕文明者，微特不能效吾日本，捨生割愛，冒死嘗苦，其於主維新之元祖，宰文
明之耶穌，尤擯而棄之，視等西子蒙不潔，莫論與一事，創一議，總是避去「耶穌」二字。尤可奇
者，通商五十餘年，海外之士，睹支那垂危慘狀，何嘗無痛心疾首，謀為贊襄扶救？奈何其生於不
懼之國，習於不懼之教，所任亦為不懼之職，而乃一渡華海，頓失其剛毅正直之念，舉凡著述談



吐，靡不曲盡華人故態。其於最寶貴、至關重之耶穌，尤不肯相互並提。或詰其何必然，彼則曰：「速則不達。我欲枉尺直尋，使其徐就範圍。」噫！徐者老也。五十年於茲，可謂徐之至。一事無成，徒增煩惱。再一轉瞬，國雖不滅，而地亦見割矣！坐談無補，是不足責也。獨夫躬膺公使、職稱命婦者，亦皆本於救世愛鄰而來；乃一入燕京，除朝覲宴會之外，恆守居是不非。雖曾代遞耶穌經卷，未聞稍一追詢是書蛀壞存沒，是又胡得謂愛中國者乎？噫吁嘻！自救既難，望救亦自不易。從是觀之，支那欲不垂滅，其可得哉？^⑪

總而言之，李春生面對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天演論」大行的時代思潮時，堅定地站在上帝創造論的立場，對天演論嚴加批判^⑫。他希望未來的中國：「地多拜堂，人皆信主，國之強盛，駢駕歐洲，是鄙人所仰望於將來者。」^⑬

三、第二項抉擇：從社會頂峰中退隱

李春生生命中所面臨的第二項抉擇就是「仕」或「隱」的抉擇。「仕」或「隱」的抉擇，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常常面臨的困境。《論語·衛靈公》記載孔子稱許衛國大夫蘧伯玉說：「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孔子又說：君子之進退出處，應「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但是，孔子所揭示的只是理想性的原則，在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之際，特別是外族入主中國的新王朝中，知識分子卻未必能夠從容自處，進退自如。

乙未割臺，對包括李春生在內的臺灣漢人而言，都造成其心靈上的巨大撞擊。

在日本帝國開始統治臺灣之時，李春生已是臺灣社會的領袖，他對臺灣地位的重要性早有深刻的認識。他說：



臺灣僻處南五省之東，隔洋僅數百里。孤懸海外，縱橫富麗，甲一巨省。雖然孤島遠懸，險要地利，識者以謂東南半壁屏藩。以形勢而論，枕橫閩、浙各口，貫通西、北二洋，為東南七省咽喉重地。其利害也，有若唇齒之關，得之，藉以振國威，保疆宇；失之，不但辱國體，資敵勢，且沿海七省因其戕，水師一帶受其制。外侮一動，內患鼓惑。臺灣一島，關係中華全局，自宜加意保守，萬勿疎忽輕視。^⑭

李春生自幼學習英文，少年時期任職洋行買辦，通曉世界新局勢，他在上文中說：「臺灣一島，關係中華全局」，確屬遠見。

李春生不僅對臺灣地位的關鍵性有其深刻的了解，對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國勢之強盛，也完全肯定。他說：

自臺灣生番頑化，殺害琉球數命，殆累中日兵戎相見，由是而東亞細亞諸國，強弱形勢乃瞭如畫圖。談天下者，每抒所見，刊諸日報，論衡時局，詆日本驟變國制，步武西法，或譏其輕狂，或嗤其尾大；總而言之，皆藐其國小而勢弱，不足以輕重。縱論紛紜，共相詆毀，眼前雖資悅性怡情，獨於鄙見，則謂非徒無益，而尤害也。作者不無大失檢點，而徒為他人作嫁衣裳乎？因所論實有裨於日本，而無益於其鄰，名雖削其威風，實則激其士氣。^⑮

從上述李春生對臺灣的重要性及日本的興起之認識看來，李春生對一八九五年日本領臺以後的新局面之感受，勢必較一般人深刻，也必然要面對「仕」或「隱」的抉擇問題。

從李春生所發表的相關文字看來，李春生對於中國歷史上政權遞嬗之際的隱者並不讚許。舉例言之，李春生對殷周鼎革之際的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的行為，就大加批判。他說：

夫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不守父命，是不孝也；棄位而逃，是不忠也；幸而陷其可繼之弟，蹈僭奪之名，是不義也；不幸而國破家亡，流離失所，是不仁也。不孝、不忠、不義、不仁，加又扣馬諫阻人之為善，且又采薇作歌，誓不食粟，餓且及死，是怨也。五者之間，不免居其三四，又所以教天下，尚得謂仁賢之無怨者乎？（略）因是而知夷、齊之行，不但無以稱於當時，而亦不足以示於後世。¹⁶

而且，正如前文所說，李春生認知割臺之事實已無可逆轉，他對於日本之敬信耶穌，更是推崇備至。他說：

目下臺灣割地，占領成交，又蒙樺山公錯愛，得以驥附東遊，藉睹諸兄弟尊顏，恍然如親聖徒，私心默記，凡百皆驗《聖經》懿旨。今日之會，歡慰無任，要無甚他陳，惟最可徵者，上帝權靈報施，幾乎無惡不報，非必概施于幽冥。試觀日清之戰，勝敗之分，事在目前。有心主道者，當洗心引鑑，毋曰智慮機謀，能自為徼幸也。蓋日本地卑國小，人寡財促，此天下所共知者；惟差強在政寬俗厚，任民敬信耶穌，昭事上帝。若清國者，地大物阜，民繁財富，勝於東洋十倍，亦天下所共見者；差短在政殘民頑，肆皇天于弗尚，君民一心，驅逐聖教，此所以敗也。幸而未及淪胥以亡者，是上帝恩施格外，使其將知悔也。¹⁷

他對日本皇宮內大小官員均「溫文爾雅，逢人施禮，靄〔藹〕然可親」¹⁸的禮儀教養，更是印象深刻。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春生根本就反對傳統中國「嚴夷夏之防」的觀念。因此，他說：



〔日本〕所以今之富強而處天下之邊者，教必以順天者存之道，神必專誠昭事上帝，政亦必以仁愛和平為治。斯皆行中國三代之政教者，而人反謗其謂夷狄。試問以三代政教為政，而誣謂夷狄，則其自處，豈非不守三代政教之諸夏者？夫「諸夏」二字，是能行三代政教所由稱也；「夷狄」二字，是不行三代政教所由取也。今欲不守三代政教，而詡謂諸夏，讓人獨擅三代政教，而誣謂夷狄，而並勸人變夷用夏者，亦遭其譏，謂變夏用夷？嗚呼！謂其執古，實則輕古（略）¹⁹

在以上這一段文字中，李春生認為日本「以三代為政」，所以不可稱為「夷狄」，而中國則「不守三代政教」，難以自居華夏。李春生的論點與十七世紀以降日本思想家山鹿素行（一六三二—一六八五）等人的論點，可謂前後輝映。山鹿素行在寬文五年（一六六五）撰《聖教要錄》，對朱子的形上學有所批判，觸怒幕府當局，因而被流放到赤穗。

寬文九年（一六六九），山鹿素行四十八歲時，在流放赤穗期間撰成《中朝實錄》一書，主張日本皇統一貫，具有優越性，超邁其他各國，應稱為「中華」、「中朝」或「中國」²⁰。十八世紀的佐久間太華（？—一七八三）也說：日本政治安定，可以稱為「中國」²¹。淺見炯齋（一六五二—一七二一）更說：「吾國知《春秋》之道，則吾國即主也。」²² 凡此種種言論，均以日本得中華文化之精華，不應被目為「夷狄」。李春生也採取這種看法。

那麼，李春生在日本統治臺灣以後，為什麼不積極出仕，反而在一八九六年訪問日本歸來以後，走向歸隱的道路呢？

關於這個問題，李春生所撰的《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中有一段第一手史料可以作為證言。²³ 李春生在訪問日本期間，曾在東京淺草觀劇，劇目是中日甲午之戰。他看到中國慘敗，痛徹心扉，感嘆寫道：



惟是新恩雖厚，舊義難忘。予雖忝為棄地遺民，自願改收入籍，然此等慘目傷心之景，在他人興高采烈，務期爭先快睹，獨予則任怨思，終是不忍躬親一視，以免重興賈子之嘆！²⁴

這一段證言具體地說明李春生在割臺之後所經歷的複雜心境。日本帝國在臺灣的新統治者樺山資紀對李春生禮遇有加，特邀赴日訪問，使李春生深為感激。但是，另一方面，他對中國的念舊情懷與故國深情，終無法一朝抹煞，所以他在東京感嘆道：「新恩雖厚，舊義難忘！」

在舊「文化認同」與新「政治認同」之間，李春生的身分雖然在乙未割臺並訪日歸來之後，已經從他自稱的「棄地遺民」，一變而為日籍華人，但是他終究未能在「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拉鋸之中，安頓自己的身心。所以，面臨「仕」或「隱」、「進」或「退」的兩難抉擇，李春生在訪問歸來以後，選擇以著作自娛的退隱之路。²⁵

四、結論

在近百年來東亞歷史旋轉乾坤的歷史轉捩點上，臺灣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歷史因素，常居於關鍵之地位。最近百餘年來，臺灣歷史經歷幾個重要的轉捩點：一八九五年乙未割臺，日本帝國開始統治臺灣；一九二〇年中西新舊思潮激盪，臺灣文化更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光復；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兩岸分治；一九八七年戒嚴令廢除，臺灣邁向民主政治。在上述歷史轉型期中，臺灣與東亞各國，尤其是與中國大陸，均有複雜的互動關係。在臺灣歷史的諸多轉捩點中，一八九五年日本統治臺灣最為重要，其影響至今仍餘波盪漾。李春生正是一八九五年這一場歷史風暴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本文以李春生這位歷史人物為中心，分析在割臺以後政權鼎革、西方思潮東來之際，李春生所面臨



的兩次重大抉擇。我們的探索顯示：李春生一方面堅採上帝創造論，力抗達爾文的演化論，另一方面，在日本領臺之後選擇歸隱，以保持他對漢文化的認同。李春生的這兩項抉擇，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臺灣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注釋

- ① 參看吳光明：〈李春生的基督教人生原則〉，收入李明輝編：《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五年），頁42-70。
- ② 參看李明輝：〈李春生《東西哲衡》及《哲衡續編》中的哲學思想〉，收入李明輝編：《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頁2-41。
- ③ John Dewey, *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8-9.
- ④ Philip P. Wiener, *Evolution and The Founders of Pragmat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⑤ 參考 Paul A. Carter, *The Spiritual Crisis of the Gilded Age*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1).
- ⑥ 李春生：《東西哲衡》，頁21下半頁。
- ⑦ 李春生：《天演論書後》，頁12下半頁至頁13上半頁。
- ⑧ 李春生：《天演論書後》，頁89下半頁。
- ⑨ 李春生：〈論書有萬不可缺道有世所必宗〉，刊於《萬國公報》（無卷期，同治十三年出版）（臺北：華文書局，一九六八年影印本），第一冊，頁447-449。
- ⑩ 李春生：《東西哲衡》，頁121。
- ⑪ 李春生：《民教冤獄解》，頁35-36。
- ⑫ 關於這個問題的詳細討論，參考黃俊傑：〈李春生對天演論的批判及其思想史的定位——以《天演論書後》為中心〉，收

- 入李明輝編：《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頁 71-109。
- ⑬ 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頁 42。
- ⑭ 李春生：《主津新集》，卷一，頁 10 上半頁。參看吳文星：〈清季李春生的自強思想——以臺事議論為中心〉，收入李明輝編：《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頁 110-139。
- ⑮ 李春生：《主津新集》，卷一，頁 27 下半頁至頁 28 上半頁。
- ⑯ 李春生：《主津新集》，卷四，頁 21 下半頁至頁 23 上半頁。
- ⑰ 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頁 41。
- ⑱ 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頁 56。
- ⑲ 李春生：《主津新集》，卷二，頁 86 下半頁至頁 87 上半頁。
- ⑳ 山鹿素行：《中朝實錄》，收入廣瀨豐編：《山鹿素行全集》（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四二年），第十三卷，上冊，頁 226。
- ㉑ 佐久間太華：《和漢明辨》，收入《日本儒林叢書》（東京：鳳出版，一九七八年），第四卷，論辨部，〈序〉，頁 1。
- ㉒ 淺見炯齋：〈中國辨〉，收入《山崎闇齋學派》（東京：岩波書店，一九八二年日本思想大系版），頁 418。
- ㉓ 參看黃俊傑、古偉瀛：〈新恩與舊義之間——李春生的國家認同之分析〉，收入李明輝編：《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頁 220-256。
- ㉔ 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頁 51。
- ㉕ 參看古偉瀛：〈從棄地遺民到日籍華人——試論李春生的日本經驗〉，收入李明輝編：《李春生的思想與時代》，頁 106-219。

（作者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

